



柯大卫文本为中心的圣经诠释进路

衣安诺  <https://orcid.org/0009-0003-4250-4936>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15733980909@163.com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英国著名旧约学者柯大卫（David J.A. Clines）学术生涯中关键的方法论转向及其后续整合。通过对其代表性著作《五经的主题》与《以斯帖卷轴：一个故事的故事》的细致研读，本文论述柯大卫如何在批判传统历史批判方法的基础上，转向以文本最终形态为中心的文学共时性批判，并在此框架内重新定位历史批判的功能。本文首先分析《五经的主题》如何系统批判当时盛行的“原子主义”和“起源论”倾向，确立“最终形式”（final form）作为释经的首要对象。随后，以《以斯帖卷轴》为案例，展示柯大卫如何将文学批判的洞见作为工具，反向考察文本的成书历史，从而实现共时性分析与历时性研究的创造性结合。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柯大卫的方法论不仅回应了历史批判的局限，也为圣经研究提供了一种既尊重文本完整性，又兼顾其历史深度的综合性诠释模式。

关键词：柯大卫、历史批判、文学批判、最终形式、五经、《以斯帖记》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12_\(27\).0007](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12_(27).0007)

投稿日期：2026 年 3 月 20 日

接受日期：2026 年 8 月 6 日

刊登日期：2026 年 10 月 21 日

一、引言

圣经历史批判 (Historical Criticism) 作为现代圣经研究的重要范式，其核心精神在于运用理性的批判性思考，拒绝一切先入为主的神学预设，转而关注圣经文本的历史起源、处境关联及编修特征，试图通过对文本的理性分析来重构以色列的历史与宗教本质。¹在圣经研究学界中，历史批判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学者们借助来源批判、形式批判与传统历史批判，致力于揭示圣经文本自身的最初形式和历史发展过程。19 世纪，随着学者们日益摒弃对圣经本质的传统神学视角，转而接受人文主义观念，来源批判 (Source Criticism) 应运而生。这一方法的起源于学者们发现五经文本中存在诸多不连贯、重复及神名交互使用的现象。²以威尔豪森 (Julius Wellhausen) 为代表的学者将这一方法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文本假设论” (Documentary Hypothesis) ³。针对来源批判主要关注书面文献而忽略口述传统的问题，古克尔 (Hermann Gunkel) 在 20 世纪初开创了形式批判 (Form Criticism) 。形式批判关注圣经中细小的叙述单元，通过分析其文学体裁 (Gattung) ，试图还原这些单元最初产生并发挥功用的社会历史环境，即“生活场景” (Sitz im Leben) 。⁴在来源批判与形式批判的基础上，冯·拉德 (Gerhard von Rad) 与诺特 (Martin Noth) 等学者进一步发展出了传统历史方法 (Tradition-History Method) 。这一方法试图弥合口述单元与长篇书面著述之间的鸿沟，并关注传统内容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传递、重释并最终融合。⁵综上所述，圣经历史批判这一学术范式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圣经文本形成过程的理解，使圣经研究从神学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范畴。然而，历史

1 田海华，《圣经诠释的历史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第 231 页。

2 田海华，《圣经诠释的历史与方法》，第 235 页。

3 Julius Wellhausen,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Israel* (Edinburgh: A. & C. Black, 1885).

4 Hermann Gunkel, *The Folktale in the Old Testament*, translated by M. D. Rutt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87).

5 田海华，《圣经诠释的历史与方法》，第 256-258 页。

批判方法也因其高度的假设性，对文本统一性的破坏以及对考古实证的忽视而面临挑战。这种对文本历史背景的过度挖掘，有时会导致对文本最终形式及其文学整体性的忽视。

20 世纪下半叶，文学批判与叙事批评逐渐兴起，对圣经文本提出了新的解读方式。学者开始倡导以文本自身为中心的共时性（synchronic）研究范式，主张将圣经的最终形态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与文学完整性的整体来阅读，强调其情节、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与修辞特征。¹阿尔特（Robert Alter）的《圣经叙事艺术》²和斯滕伯格（Meir Sternberg）的《圣经诗学》³强调圣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手法。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历史批判的局限，凸显了文学整体性的重要性。利科（Paul Ricoeur）的《圣经解释论文集》⁴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圣经诠释领域，强调文本的自主性。同时，蔡尔兹（Brevard S. Childs）的《作为经典的旧约导论》⁵提出正典批判，主张应从最终形态出发理解圣经文本，极大推动了“文本中心”的方法论转向。⁶在此方法论转向中，英国学者柯大卫（David J.A. Clines）扮演了独特而关键的角色。⁷他既深刻反思历史批判传统，又积极推

1 菲利浦·R·戴维斯(Philip R. Davis),《多学科圣经研究 50 年》,《圣经文学研究》第 18 辑(2019 年春),第 26-27 页。

2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3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Paul Ricoeur, *Essays 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Lewis S. Mudg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0).

5 Brevard S.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9).

6 高峰枫,《经学的反击:正典批判对圣经考证的诘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6 期,第 95-98 页。

7 作为知名的圣经研究学者,国际学界针对柯大卫的研究颇多,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为《从右向左阅读:致敬柯大卫的希伯来圣经论文集》和《利益相关的读者》两部论文集。文集主要收录对柯大卫的圣经批判方法论进行直接或间接回应的文章。而在汉语语境中针对柯大卫圣经批判思想的研究较为匮乏,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著作的翻译引介以及对其学术生平与贡献的概述性介绍,没有出现针对柯大卫的圣经批判方法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章或专著。参 J. Cheryl Exum and H.G.M. Williamson, eds., *Reading from Right*

动文学批判方法，但并未简单在两者之间择一而从。相反，他的学术实践体现了一种综合性的探索：如何在坚持以文本为中心的同时，为历史批判保留有意义的位置。这一探索的核心是“文本优先”原则。

柯大卫通过其学术实践，完成了从历史批判到文学批判的重心转移，但并未完全弃绝前者，而是将其纳入一个以文本最终形态为出发点与归宿的框架。他主张首先对文本最终形态进行共时性的文学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回溯其成书历史（literary history）与功能历史（functional history）。这一方法论的转型与整合，在他的两部著作《五经的主题》和《以斯帖卷轴：一个故事的故事》中得到体现。本文选取这两部著作，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柯大卫方法论发展的两个递进阶段。在《五经的主题》中，柯大卫主要对传统来源批判进行反思，确立了以最终文本形态为中心的原则，目的是在庞杂的文本中寻找整体的主题。而在《以斯帖卷轴》中，他进一步将文学批判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通过分析叙事逻辑来重构文本的成书过程。因此，本文将以这两部著作作为核心文本，分三节展开讨论。第一节探讨作为柯大卫文学批判核心的文本优先性原则，揭示其如何重塑历史批判的目标与功能，使之从源头探寻转向对文本最终形态形成过程及社群功能的阐释；第二节聚焦《五经的主题》，分析柯大卫如何运用此原则对历史批判进行反思并构建其共时性框架；第三节则转向《以斯帖卷轴》的案例，展示其如何将文学批判用于历时性探究，从而实现方法的有机结合。同时，本文试图进一步考察这一方法背后的理论预设及其解释限度，围绕三个问题进行思考：第一，文本最终形态

to Left: Essays on the Hebrew Bible in Honour of David J.A. Clines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James K. Aitken, Jeremy M. S. Clines, and Christl M. Maier, eds., *Interested Readers: Essays on the Hebrew Bible in Honour of David J. A. Clines*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14); 另参克莱斯 (David J.A. Clines), 吴致莹、陈永财、谢乐知译,《克莱斯论诗篇》(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 姜宗强,《柯大卫》,《圣经文学研究》第2辑(2008年),第377-382页。柯大卫 (David J.A. Clines),《以赛亚书第40章中的多种声音》,姜宗强译,《圣经文学研究》第2辑(2008年),第86-107页。柯大卫 (David J.A. Clines),《圣经研究的学习,教学和研讨:现状与未来》,马乐梅译,《圣经文学研究》第7辑(2013年),第1-33页。

是否真的具有可被发现的内在统一性，还是这种统一性本身依赖读者的文学判断？第二，柯大卫所提出的“统一主题”是否能够充分处理复合文本内部的多重声音与神学张力？第三，“文本最终形式”的界定是否具有模糊性？

通过这一系列分析，本文旨在勾勒柯大卫在圣经研究方法论谱系中的独特位置，说明其结合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的重要贡献，并对柯大卫文本为中心的圣经诠释方法进行反思。

二、文本的优先性原则

柯大卫学术路径的核心，并非在于提出一种新的文学方法以取代旧有的历史方法，而在于对诠释方法优先级的重构。这场重构的核心原则是“文本的优先性”（the primacy of the text）。它不仅改变了研究的起点和重心，而且重新界定了历史批判的地位和功能：历史批判不再承担揭示文本背后真正意义的终极任务，而是转化为理解文本最终形式意义的辅助工具。

在传统的历史批判范式中，文本的最终形态往往被视作一个需要拆解的对象。诠释者的主要任务在于穿透表面形式，以追溯更古老，因而被认为更符合作者原意的来源、传统或历史事件。最终形态的意义，常常被简化为各组成部分意义的叠加，甚至被视为编修者误解或机械拼合的副产品。蔡尔兹坚决批判这种背离文本的释经方式，指出历史批判执着于挖掘文本背后的原始材料和来源，却不重视圣经最终正典形态，违背教会释经传统，也错失圣经真正的神学信息。¹利科也强调圣经文本的意义独立于作者心理与初代读者感受而存在，认为在文本中应当被理解的并不是作者或其预设的意图。²在学界逐渐重视文本地位的趋势影响下，柯大卫也重构了这一优先级。他明确指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最终形式才是诠释的起点与中心：“五经并不仅仅是圣经前五卷书的总和……而是一部

1 Brevard S. Childs, *Biblical Theology in Crisi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0), pp. 99-104.

2 Paul Ricoeur, *Essays 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Lewis S. Mudg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0), p. 64.

自身独立的著作”。¹无论其来源如何复杂，其最终形态本身便构成了一个有意而为的意义整体。因此，诠释的首要任务，是借助共时性的文学批判，揭示这一整体的结构和主题。

在确立最终形态的优先地位之后，历史批判才被重新引入。然而此时，它的目标与功能已发生根本转化。柯大卫关注的历史，并非遥远而难以确证的“事件史”（history of events），而是围绕文本本身的“功能史”（functional history）和“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首先，关于“功能史”，柯大卫将历史批判的重心从单纯的溯源转向探究文本在特定历史处境中的作用与功能。在《五经的主题》中，他提出：在完成文学批判之后，必须追问五经在其最终形态形成的时代对当时群体的功能。²他的回答是，这一部以“部分应验的应许”为主题的著作，切合了回归社群的生存处境。他们既蒙允回归，却仍处于未竟之境：圣殿尚在重建，国土仍受外邦统治，民族尚未完全复兴。在此语境下，五经的开放性结局为社群提供了一个神学框架，使其能够在“应许已然”与“应许未然”的张力中理解自身处境，并在忍耐与忠诚中怀抱盼望。³

其次，关于“文学史”，柯大卫强调对文本在流传与增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轨迹进行重构。《以斯帖卷轴》即是此路径的典型范例。⁴他借助文学批判识别出马索拉文本内部的叙事张力，从而提出“原生马索拉故事”的可能存在，并通过跨版本比较重构出更早的“前马索拉故事”。这种历时性的探讨，其目的并非主张早期形态比最终形态更为真实或更具价值，而是揭示文本在编修、扩展过程中意义的动态生成。例如，一个原初的宫廷故事如何因“法律不可更改”的母题而深化了戏剧张力，又如何因第九、十章的增补而与普珥节礼仪结合，从而获得了新的群

1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Sheffield: JSOT Press, 1978), p. 18.

2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96.

3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p. 97-99.

4 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4).

体意义。在此意义上，历史批判的功能可被理解为一种“文本考古学”：它揭示最终形态的层次性与复杂性，而非削弱其诠释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在柯大卫的方法中，历史批判不再是独立目的，而是服务于文本诠释的环节。对历史语境的重构，并非意在将意义限定于某一过去的时刻，而在于解释为何文本最终形态被塑造成现在的样貌。这一进路与蔡尔兹的正典批判有一定相似性：二者均重视文本在信仰群体中的功能。但柯大卫更强调从文学批判出发揭示文本结构与主题，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其原初社群功能。他的历史关切集中于文本的成书与接受过程，而非事件本身的重建。

通过这种重新定位，柯大卫在其诠释体系中为共时性与历时性方法确立了各自的位置。共时性的文学批判拥有优先地位，因为它直接面对作为意义整体的最终形态；历时性的历史批判则发挥着两个关键的辅助功能：一是通过功能史解释最终形态在原始社群中的作用与意义；二是通过文学史揭示最终形态的形成过程与深层结构。二者最终都指向同一目标：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当下手中之圣经文本。柯大卫由此既避免了传统历史批判的文本碎裂化倾向，也避免了纯粹文学形式主义的去历史化风险。他以“文本的优先性”为核心原则，构建起一个纳入综合性框架的诠释模式，使共时性与历时性在统一的循环中相互启迪、彼此成全。

然而，“最终形式”作为诠释起点这一原则本身也包含值得进一步检讨的理论预设。柯大卫假定最终文本具有可以被揭示的内在整体性，但这一假定并非没有争议。对于复合性圣经文本而言，文本最终形态虽然已经完成编纂，却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中存在单一且稳定的意义结构。编者对不同传统材料的并置，有时并非为了消除张力，而可能有意保留不同声音之间的竞争关系。因此，将最终文本理解为一个“统一整体”，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一种特定的文学判断：即文本中的矛盾可以通过更高层次的主题整合获得解释。这一判断虽然能够克服历史批判碎片化的问题，但也可能弱化文本内部真实存在的不一致性。

下文将通过对《五经的主题》和《以斯帖卷轴》的分析，具体展示柯大卫如

何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圣经诠释并考察其有效性。

三、从起源论到整体论的转向

柯大卫的“文本优先”原则，首先在其著作《五经的主题》中得到了系统性的阐述与实践。在该书的开篇，柯大卫明确确立了其学术立场。他指出，这本书的方法与内容旨在对当时旧约研究中的两大主流倾向——“原子主义”（atomism）与“起源论”（geneticism）——进行批判性挑战。¹这两个术语准确概括了历史批判方法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所谓“原子主义”，是指研究重心被无限微缩，学者往往专注于单个词语、半节经文或孤立的文学形式的考据，而忽视了这些细微单元在更大文本结构中的位置与功能。这种研究路径虽然能产出数量可观且表面严谨的成果，但却削弱了学者对文本整体结构与意义的把握。而“起源论”则是历史批判的核心预设，即“若揭示了一个对象的起源，则能获得对它的最佳理解；若重构了一个文本的来源并确定其前史，则能获得对它的最佳诠释”。²在这一思路主导下，五经研究几乎被简化为对假定来源³的分割、重构与神学分析，最终文本的整体形态反而被悬置或忽略。

柯大卫的批判直指当时学界的权威范式。他指出，二十世纪五经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部著作——拉德的《六经问题》与诺特的《五经传统史》——都是起源论方法的典型代表。⁴拉德认为“六经”（五经加约书亚记）的结构源于历史信条（historical creed）的发展，并最终由耶典（Yahwist）神学家整合；诺特则进一步追溯五大传统主题（出埃及、入地、先祖应许、旷野引导、西奈启示）在

1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7.

2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9.

3 威尔豪森提出五经是由 JEDP 四个不同的来源合并而成的，参 Julius Wellhausen,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pp. 17-410. 因为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对文本的假设，缺乏实质性的证据，所以 JEDP 被认为是假定来源。

4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9.

口传阶段的独立起源及其文学结合过程。二人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关注点始终停留在文本“形成之前”与“形成过程”，而非“形成之后”的最终形态。对此，柯大卫总结道：“两个世纪的圣经批判训练我们去五经的来源中，而不是在最终产品中寻找统一性”。¹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柯大卫提出了他的方法论主张：研究必须从“五经的最终形式”（the Pentateuch in its final form）出发。²其一，他将研究对象从不确定的假设性来源转回确定的文本本身，因为过分纠结于前史与来源划分，只会使研究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其二，他重新界定了“统一性”的概念：不是作者意图或来源的统一，而是最终文本在文学结构与主题呈现上的统一。他关心的是“五经作为一个整体在讲述什么”。³这一共时性的视角，暂时悬置了成书过程，而聚焦于文本当下的面貌。虽然都主张回归文本的最终形态，但柯大卫主张的最终形式与蔡尔兹的正典批判有所不同。首先，二者对圣经文本最终形态的认识和研究方法不同。蔡尔兹认为圣经文本最终形态见证了上帝与以色列民相遇的历史，不能将其与以色列民见证过的神圣事实分离，他重视最终形态作为“正典”的神学权威性，主张在信仰群体的神学功能中理解圣经文本⁴；而柯大卫则是将其看作历史文学作品，对其内部的情节、结构和主题进行文学批判层面的理解；其次，二者对最终形态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蔡尔兹之所以聚焦文本最终形态，是为了探究现存文本是如何被构建为对历世历代延续的宗教社群具有神学功能的圣经。⁵而柯大卫研究最终形态的统一主题，不仅意在探寻其对处于流亡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圣经读者群体产生的神学和社会现实意义，也希望进一步说明最终形态文本如何对现代普通读者产生跨时代的宗教与文学功能。总体而言，蔡尔

1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5.

2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10.

3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5.

4 Brevard S.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9), pp. 72-73.

5 Brevard S.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 96.

兹的最终形式是神学的，比起文本的文学完整性，他更关心文本作为信仰群体规范性经典的身份。而柯大卫的最终形式则是文学性的，他关心的是文本作为自足的文学整体如何产生意义。蔡尔兹的回归是“回归正典”，柯大卫的回归是“回归文本”。这一区别决定了二人虽然共享“最终形式”的术语，却在诠释目标和路径上分道扬镳。因此，柯大卫的主张有别于正典批判，具有独特的意义。

为落实“从最终形式出发”的方法，柯大卫选择“主题”（theme）作为进入五经整体的起始点。他的“主题”概念有别于诺特（Martin Noth）所提出的传统定义，后者将“主题”视为传统材料的集合体。柯大卫首先批判诺特定义的局限性，随后系统阐述一个新的“主题”定义，探讨其在文本分析中的方法论问题，并最终论证其应用于《五经》整体研究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诺特将“主题”定义为“传统材料的集合体”（complexes of traditional material），具体指涉以色列早期历史的简要概括，如“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等。这些简要事件概括在后期发展中被扩展为叙事。据此，诺特认为《五经》由五个主要主题（出埃及、进入耕地、先祖应许、旷野引导、西奈启示）及若干次要主题构成。¹然而，此种定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其本质是一种材料分类学，而非对文本内在统一性的阐释。诺特所识别的各个“主题”单元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关联，它们既非相互预设，也非彼此依赖，因此无法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为克服上述诺特的局限，柯大卫提出一个由五个维度构成的新“主题”定义。

2

第一，主题是情节的概念化（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lot）。³主题并非对文本内容的简单概括，例如“《五经》记述了从创世到摩西之死的故事”仅为内容摘要。情节是事件的因果关系叙述，而主题则是对这一因果序列的抽象和深化，揭示其背后的普遍意义，如“权力如何导致人性的异化”或“神圣计划与人类意图

1 Martin Noth, *A History of Pentateuchal Tradition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2), pp. 46-62.

2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p. 17-20.

3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17.

的偏离”。

第二，主题是作品的支配性思想。按照斯劳尔与希伯德 (Thrall & Hibberd) 的观点，主题是“一部文学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一个通过人物、行动和意象得以具体化的抽象概念”。¹这一思想并非先于作品存在，而是在文本的最终形态中得以实现和呈现。

第三，主题是文本的内在理据 (rationale of the content)。²它为最终定稿文本的内容选择、结构安排与情节发展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此处的分析视角并非溯源性的或历史性的，而是共时性的，聚焦于文本的成书形态。

第四，主题在文本建构与阐释中承载着关键的功能。它不仅发挥着引导读者进入文本世界的导向作用，驱动着阐释循环的不断校准和深化，还具有纠偏作用，为文本提供一个整体性的阐释框架，从而防止大规模的误读。在此基础上，主题为作品的统一性提供证明，论证文本是一个连贯的有机系统，而非不同来源材料的随意堆砌。更为重要的是，主题能够在历史阐释与当代解读之间建立桥梁，既有助于探寻作者或编者的原初意图，即历史批判的目标，也为后世的诠释设定了边界，以避免过度阐释。

第五，为了提高定义的精确性，需进行必要的术语辨析。主题不同于“作者意图” (authorial intention)：它比意图更窄，因其仅指涉那些在文本形态中得以体现的意图；同时又比意图更宽，因为它未必是作者有意识自觉构建的。³主题亦区别于“母题” (motif) 或“类型场景” (type-scene)，后者是微观的、可重复的叙事单元，而主题则作用于宏观的、统摄全书的层级。主题还有别于“题材” (subject)，题材旨在对内容进行分类 (classify)，而主题则是“对特定题材所持的态度、观点或洞见”⁴。最后，主题可以是隐性的或显性的。多数文学作品的

1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18.

2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18.

3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19.

4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19.

主题较为隐晦，但部分史诗，如《伊利亚特》会在开篇明示。就《五经》而言，其自《创世记》12章起的主体部分，主题相对显明，但统摄全书的整体主题则需要更为细致的辨识与论证。

基于上述定义，柯大卫进一步探讨主题分析中的四个关键方法论问题。¹其一，主题是否唯一？他主张一部连贯的作品只存在一个终极的、最具包容性的主题。尽管在不同的抽象层级，如情节层面与结构主义模型层面上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表述，但对统一性的追求是作品内在的结构性要求。虽然《五经》的材料来源极其复杂，但这并不先验地排除其最终形态被赋予一个统一主题的可能性。其二，如何证实一个主题？柯大卫认为证实主题的唯一标准在于该主题陈述是否能最充分、最全面地解释文本现有的内容、结构与发展脉络。主题分析的本质即回答：“作品以其现有形态呈现，其意义何在？”²其三，如何发现主题？发现主题并无固定的技术程序，通常需要通过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在对题材、情节和母题的分析中筛选可能的候选陈述。对于显性主题，则需直接观察文本自身的表述。其四，主题是否必须为作者所意识到？柯大卫的答案是否定的。主题是一个批评工具，旨在帮助阐释者理解作品的统一性，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无需依赖此概念进行自我导向。主题与作品共生，但其概念化表述未必为作者自觉持有。尤其对于圣经这类文本，作者或编者的意图只能通过对最终文本形态的推断来把握。

最后，将此理论框架应用于《五经》研究，面临两大核心问题。首先，来源、时期和观念迥异的《五经》材料是否可能具备统一主题？这一挑战是显著的，冯·拉德曾称《六经》的复合性“已达到可读性的极限”³。然而，其可能性依然存在。诺特本人也承认不同来源的组合可能产生“一个超越各部分总和的新事物”，拉德亦曾呼吁学界对《六经》整体的基本主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⁴事实上，对

1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p. 20-21.

2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21.

3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22.

4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22.

文本的细微改动或材料的并置便足以重塑整体意义，例如对耶典 (Jahwist) 文献结尾的重构即可改变其整体神学意涵。其次，一位后期的编者是否有能力为庞杂的传统材料强加一个统一主题？对此，回应是双重的。一方面，编者具备相当的能动性，最小限度的干预便可改变材料的整体效果。另一方面，这种统一性甚至可能并非出于编者的自觉意图。诺特即承认，文本的统一性可能“超越编者的意识”。这再次印证了前述观点：主题的存在无需以作者或编者的自觉意识为前提。

综上所述，柯大卫通过批判诺特以材料分类为基础的理论，重构了“主题”的定义，将其界定为文本最终形态的支配性思想。一部作品的统一主题是其内在要求，并可通过对文本形态的最佳解释来加以证实。尽管《五经》的材料来源复杂，但通过编者有意或无意的整合，其最终文本形态仍可产生一个统一的主题。

基于此，他提出了这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先祖应许或祝福的部分应验，同时也意味着部分未应验”¹。这一主题完全源于对最终文本形态的文学观察。叙事的开端在《创世记》第 12 章：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包含三个要素，分别是后裔 (posterity)、神人关系 (divine-human relationship) 和土地 (land)。叙事的终点在《申命记》结尾：以色列后裔已繁衍众多，神人关系借西奈之约确立，但他们仍滞留约旦河东，未入应许之地，并且摩西也死于迦南之外。“应许”到“部分实现/部分未实现”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五经的叙事结构。柯大卫进一步指出，五经的各部分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创世记》侧重“后裔”；《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阐述“神人关系”；《民数记》《申命记》则聚焦“土地”。²

通过确立这一主题，柯大卫为五经这一庞杂的文本集合提供了统一的解读框架。律法不再是叙事的中断，而是“神人关系”的具象化；谱系不再是冗长的名字列表，而是“后裔”应许实现的见证。原本原子化的文本单元，在这一宏大主题下获得了结构性意义。此外，该主题蕴含着开放性：应许尚未完全实现，因此五

1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29.

2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 29.

经叙事始终指向未竟的未来，为圣经读者，尤其是被掳归回时期的群体，提供了理解现实处境的诠释模式。

然而，“统一主题”的寻找，实际上预设文学作品具有类似有机整体的结构，而这种整体性可以通过读者的分析被还原。但是对于《五经》这样的复合文本而言，统一性究竟是文本自身固有的结构，还是读者为了建立连贯理解而形成的阅读策略，仍然需要区分。换言之，主题并非简单地从文本中“发现”，而是在文本细节、文学结构与读者判断之间互动产生的结果。因此，柯大卫关于统一主题的论证，需要面对读者的差异性与主体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柯大卫虽在《五经的主题》中将历史批判置于次要地位，却并未完全否定其价值。在第九章“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与第十章“功能”（Function）中，他重新讨论了历史问题。但此时，研究的逻辑已发生根本转变：历史不再是理解文本意义的前提，而是以文学整体的分析结果为起点加以反思。他探讨了 JEDP 来源中可能存在的“应许”母题，以及“未应验”主题如何在流传与编纂过程中被强化。¹更进一步，他强调最终文本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所发挥的功能。以五世纪的被掳社群为例，对于一个处在“应许”与现实落差中的群体而言，一个关于“部分应验应许”的叙事，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与神学力量。²由此可见，柯大卫对历史语境问题的处理也有别于蔡尔兹。柯大卫重视的是，当五经第一次以完整的最终形态出现时，它对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最初读者，即被掳巴比伦的犹太社群产生了怎样的信仰与社会影响，而蔡尔兹所强调的“正典塑形”功能则将圣经文本从其原初历史处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其能够超越原初的接收者，从而理解圣经文本对后来的广大信仰群体的规范作用。³

综上，《五经的主题》系统展现了柯大卫从“起源论”到“整体论”的方法论转

1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p. 89-96.

2 David J. A. Clines,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pp. 89-96.

3 Brevard S. Childs,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An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4), p. 23.

向。他通过反思历史批判方法的局限，鲜明确立“最终文本”的优先性，并以“部分应验的应许”这一文学主题为纲，将五经整合为一个内在连贯的文学与神学整体。在此过程中，历史批判并未被弃绝，而是被重新安置于服务“最终形态的形成与功能”的位置。此方法论的重塑，不仅为五经研究开辟了新路径，也为柯大卫在后续学术实践中对将文学批判与历史批判进一步结合做好了理论上的铺垫。

然而，这一解释框架同时也显示出统一主题方法的限度。“部分应验的应许”确实能够解释五经从创世记十二章到申命记结尾之间的叙事张力，但它是否足以涵盖五经内部所有的重要神学声音，则仍值得讨论。例如，律法、祭司传统以及智慧神学元素是否都能够被完全纳入“应许—未完成”的结构之中。因此，统一主题的解释力与其压缩文本多样性的风险始终同时存在。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文本实践

《五经的主题》确立了文本优先原则，从整体上寻找文本的主题统一性。然而，当文本的最终形态存在明显的叙事矛盾时，单一的共时性阅读存在局限。柯大卫在《以斯帖卷轴》的研究中处理了这一问题。该书体现了柯大卫方法论的推进，他并未像处理五经那样为整卷书提取单一主题，而是将文学批判的关注点应用于历时性分析。这构成了他对前期方法论的补充。副标题“一个故事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Story) 点明了他的研究方向：既要解读《以斯帖记》作为故事的最终形态，又要追溯其自身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正是在这种双重研究任务中，他实现了共时性文学批判与历时性历史重构的有机结合。

柯大卫首先着手于马索拉文本《以斯帖记》的最终形式解读。这一研究路径与他在《五经的主题》中所强调的“以文本最终形态为起点”的原则保持一致。在著作的第一部分，他将马索拉文本作为独立完整的文学作品，运用文学批判方法对其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叙事张力及核心母题进行了细致阐释。他指出，马索拉文本的故事结构可以清晰划分为三部分：第一至二章为“铺陈” (exposition)，第三章至第九章 19 节为“主要情节” (main action)，第九章 20 节至第十章 3 节

为“结论”（conclusion）。¹在此框架下，他分析了“朝廷冲突”“王命的遵从”“种族身份”以及“法律不可逆性”等文学母题如何彼此交织，共同建构出一个带有讽刺意味和戏剧张力的叙事世界。²这一部分纯粹属于文学批判，其目标在于确立文本最终形式所展现的意义结构。

然而，柯大卫并未简单停留于文学解读。在深入的文学批判过程中，他注意到文本内部存在若干“缝隙”（seams）和逻辑不一致之处。第九章之后的叙事节奏、文学技巧以及神学关注点，均与前八章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前八章中，随着末底改信函的发出，叙事紧张感已基本化解；然而第九章却突兀地引入大规模的杀戮场景，既在逻辑上显得不够连贯，也在文学表现上较为粗糙。³此外，第9章第20节及之后关于普珥节设立的多重解释与信函也更像是对一个已然完整的故事的附加说明，而非内在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他用文学的内在逻辑去审视历史编修，相比《五经的主题》，展现了其方法论的推进。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共时性文学观察，柯大卫转入历时性探讨。他提出，马索拉文本的第九至十章为后期增补，其功能在于将一个原始的以斯帖故事与普珥节的起源相联结。这意味着，曾存在一个更早的，可称为“原生马索拉故事”（proto-masoretic story）的文本形态，而文本的叙事核心在第八章结尾已然完整。⁴在这里，文学批判的发现被纳入编修批判与来源批判的框架中。柯大卫并非依赖外部假设来分割文本，而是从文本内部的文学张力与叙事裂痕出发，推断其成书过程。

他进一步将比较研究的视野延展至《以斯帖记》的希腊文传统，尤其是长期被学界忽视的A文本。通过与七十士译本（LXX）和马索拉文本的对勘，他论证A文本并非晚期修订，而是一个独立翻译，源自与马索拉传统不同的希伯来文底

1 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p. 9.

2 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pp. 10-23.

3 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pp. 39-40.

4 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p. 64.

本。¹更为关键的是，A 文本展现出一个更为简洁的叙事版本，缺乏马索拉文本中被视为后期增补的若干要素，例如“波斯法律不可更改”的母题和对宦官阴谋的详细描绘。

这一发现具有决定性意义。A 文本为更古老的故事形态提供了见证。柯大卫由此推断，在“原生马索拉故事”之前，还存在一个“前马索拉故事”（pre-masoretic story），而 A 文本正是该形态的传承者。在这一叙事版本中，哈曼的法令可以被撤销，因此故事解决更为直接，无需马索拉文本所设计的“第二道法令”来抵消前者。²由此，柯大卫根据不同文本的比较，重构出《以斯帖记》的演变轨迹：从简洁的“前马索拉故事”，发展为内容丰富的“原生马索拉故事”（MT 1-8 章），最终形成了与普珥节密切结合的完整马索拉文本（MT 1-10 章）。

在分析的最后阶段，柯大卫还谨慎探讨了更早层次的可能性。他借鉴并发展了卡泽勒（H. Cazelles）的研究，提出或许存在两个独立的来源传统：一个以以斯帖的智慧与勇气为核心的宫廷故事，另一个则以末底改与哈曼的对立为中心的朝臣故事。这两个叙事单元在某一阶段被整合，进而形成《以斯帖记》的核心框架。³值得强调的是，柯大卫将这一来源批判的尝试置于研究的最后，而非起点。这一安排凸显了他与传统历史批判的差异：来源分析的意义在于补充，而非取代对文本最终形态的文学解读。

综上，《以斯帖卷轴》集中展现了柯大卫将“文本优先”原则付诸实践的过程。他以共时性文学批判为起点，确立文本最终形式的意义结构；继而转向历时性探讨，在文学观察的基础上识别文本成长层次，并借助多版本对勘重构其演变历史。在此过程中，文学批判与历史批判不再是二元对立，而被纳入一个综合性框架：共时批判为历时研究提供证据与方向，而历时研究则深化了对最终形态复杂性的理解。柯大卫的研究表明，以最终文本为中心的批判并非否弃历史，而是为历

1 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pp. 71-72.

2 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p. 94.

3 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pp. 115-117.

史研究开辟出更为审慎且富有说服力的路径。

本章通过对柯大卫《以斯帖卷轴》中的研究实践的分析，揭示了其方法论的根本特征在于“文本的优先性”。这一原则使他在圣经研究中完成了历史批判的功能转化：历史批判不再是探寻“事件史”的主导路径，而是被纳入到以最终形态为核心的综合性框架之中，承担揭示文本文学史与功能史的任务。借此，柯大卫在共时性与历时性方法之间建立起平衡与互动，使圣经研究既避免碎片化的倾向，又不至于落入去历史化的极端。由此，他提出了一条兼具文本完整性与历史深度的综合性诠释之路。

然而，柯大卫的方法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他对“叙事缝隙”的判断——即哪些部分是“原生”的、哪些是“增补”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文学敏感度。拉科克（André Lacocque）在其对《以斯帖记》的研究中就曾质疑柯大卫对 A 文本文学类型与价值的评估，指出柯大卫为了还原所谓的“前马索拉故事”原初核心，过度删削了不符合“智慧朝臣成功故事”常规模式的元素，从而错失了 A 文本真正的类型本质。¹这一批评给我们提示柯大卫对“原生”与“增补”层次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受其预先设定的文学类型观念所引导，并非完全从文本内部客观浮现。

其次，柯大卫对“文本最终形式”的界定也存在模糊性。当他以马索拉文本作为“最终形式”进行分析时，他实际上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为什么是马索拉文本而非七十士译本或其他版本？如果说“最终形式”是指被信仰群体接受为正典的形态，那么七十士译本在东正教传统中同样具有正典地位。如果说“最终形式”是指最晚近的希伯来语版本，那么死海古卷中的《以斯帖记》残片又该如何处理？柯大卫在实践中默认马索拉文本为“最终形式”，但这一定位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而非预设的前提。

综上所述，柯大卫以文本为中心的诠释方法有效地提醒研究者重新关注文

1 André LaCocque,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Esthe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9 (1999), p. 301.

本最终形态的文学结构，但同时也暴露出现代文学批判共有的问题：文本是否拥有可被客观发现的统一意义？这样的问题促使柯大卫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进一步转向读者反应批判（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和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cal Criticism）。

五、结语

柯大卫以文本为中心的圣经研究，尤其以《五经的主题》和《以斯帖卷轴》为代表，清晰地标志着现代旧约研究领域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方法论整合与创新。本文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深入剖析，论证了柯大卫并非将历史批判与文学批判视为二元对立，而是通过确立文本优先性原则重新界定了二者的关系。他确立了文本最终形式的优先地位，坚持诠释应当始于并归于我们现存的文本；同时，他也发挥了历史批判揭示文本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历史社群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柯大卫的方法论将文学与神学维度的共时性解读置于核心位置，同时将历史批判转化为理解文本形成过程及其在特定社群中功能的辅助工具。

柯大卫以文本为中心的诠释进路的核心贡献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它有效克服了历史批判将文本过度碎片化的弊端，尊重了圣经作为一部文学与神学著作的整体性和有机性。第二，它避免了纯粹文学批判可能导致的“去历史化”风险。第三，通过引入“功能史”与“文学史”，柯大卫为经文在历史与当下信仰社群中的现实意义搭建了桥梁。与同期采用正典批判进路的蔡尔兹相比，柯大卫同样认可最终文本的研究价值，反对将文本还原为历史来源与文献片段。但蔡尔兹的研究以宗教社群既定的正典框架为前提，其诠释始终受到神学权威的约束。柯大卫则放弃了外部正典规范，彻底将诠释重心落于文本内部的主题脉络与文学逻辑，为学术语境中的文本整体诠释提供了更具独立性的路径。与利科的哲学诠释学进路相比，柯大卫吸收了其超越历史批判，回归文本意义的思路，但并未停留在普适性的哲学理论层面。柯大卫强调文本脱离作者意图后的自主性，这无疑与利科的哲学诠释学产生了共鸣。但是，利科的研究侧重文本诠释的一般哲学原理，并

以此分析圣经的语言形式，将圣经诠释视为普遍诠释学内部的一种独特的区域诠释学¹，旨在揭示“文本面前的世界”以及读者与文本相遇时存在的本体论意义。而柯大卫的文学批判则更多停留在叙事结构与修辞策略的具体操作层面。柯大卫并未完全涵括利科理论中的深层哲学与现象学维度，他更多是将文本自主性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释经工具。柯大卫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纳入同一综合性框架的路径，为圣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并为学界在文本完整性与历史复杂性之间寻求平衡开辟了新的可能。

然而，任何方法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局限性，柯大卫的早期文本中心批判亦不例外。首先，在追求文本最终形态的“统一主题”时，面临着过度还原与抹杀文本张力的风险。正如部分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五经等复合文本内部往往包含了不同时代、不同派别之间相互竞争的神学声音，如若强行归纳出一个单一的宏大主题，可能会掩盖文本内部那些不和谐却极具价值的边缘声音与真实历史裂痕。²其次，这一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与自足性，忽视了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事实上，圣经文本“最终形式的主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诠释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观建构与选择。柯大卫本人在其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局限。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逐渐从寻找文本内在客观主题的文学批判，转向了读者反应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开始反思文本与读者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预设。³

综上所述，柯大卫的方法论为我们在现有的圣经文本与其漫长的历史演变之间寻找平衡提供了范例。尽管其探寻绝对统一主题的尝试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他坚持回到文本最终形态，让历史服务于文本理解核心理念在当代圣经研究

1 Paul Ricoeur, *Essays 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p. 67.

2 John Barton, *Reading the Old Testament: Method in Biblical Stud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pp. 146-149, 169-171.

3 David J. A. Clines, *Interested Parties: The Ideology of Writers and Readers of the Hebrew Bible* (JSOTSup, 205;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5), p. 16.

学界依然重要。柯大卫以文本为中心的圣经诠释路径为理解圣经提供了新的维度，他对文本完整性的强调，将持续引导未来学者将圣经文本视为一个文学整体来理解。并且，他将历史批判与文学批判相结合的倾向也为圣经诠释领域的跨学科方法整合提供了参考。因此，柯大卫的方法论在未来的圣经研究中仍具有启发意义。对于未来的圣经研究而言，如何在尊重文本最终文学形态的前提下，既不忽视其历史生成的复杂性，又保持对多元释经视角的开放，还需要我们进行不断的反思与探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Wellhausen, Julius.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Israel*. Translated by J. Sutherland Black and Allan Menzies. Edinburgh: A. & C. Black, 1885.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 Berlin: G. Reimer, 1878.
- Gunkel, Hermann. *The Folktale in the Old Testament*. Translated by M. D. Rutt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87.
- Gunkel, Hermann. *Water for a thirsty land: Israelit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Edited by K. C. Hans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 Von Rad, Gerhard. *The Problem of the Hexateuch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E. W. Trueman Dicken. London: SCM Press, 1966.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Das Problem des Hexateuch und andere Aufsätze*, 2nd e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2.
- Noth, Martin. *A History of Pentateuchal Traditions*. Translated by Bernhard W. Anders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2.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Pentateuch*. 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48.
- Alter, Robert.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 Sternberg, Meir.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Ricoeur, Paul. *Essays 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Lewis S. Mudge.

-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0.
- Childs, Brevard S. *Biblical Theology in Crisi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0.
- Childs, Brevard 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9.
- Childs, Brevard S.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An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4.
- Clines, David J. A.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Sheffield: JSOT Press, 1978.
- Clines, David J. A.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4.
- Barton, John. *Reading the Old Testament: Method in Biblical Stud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 Exum, J. Cheryl, and Williamson, H. G. M. ed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Essays on the Hebrew Bible in Honour of David J. A. Clin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373. London: T&T Clark, 2003.
- Aitken, James K., Clines, Jeremy M. S. and Maier, Christl M. eds. *Interested Readers: Essays on the Hebrew Bible in Honor of David J. A. Clines*. Library of Hebrew Bible/Old Testament Studies 600.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14.
- LaCocque, André.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Esthe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7, no. 3 (1999), pp. 301–322.
- 菲利浦 R. 戴维斯。《多学科圣经研究 50 年》，载《圣经文学研究》第 18 辑，2019，第 1-53 页。[Davies, Philip R. "Biblical Studies: Fifty Years of a Multi-Discipline" *Currents in Biblical Research* 13(2014), pp. 34-66.]
- 田海华。《圣经诠释的历史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TIAN, Haihua. *History and Method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4.]
- 高峰枫。《经学的反击：正典批判对圣经考证的诘难》。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62 卷第 6 期，第 92-101 页。[GAO, Fengfeng. "The Challenge of Canonical Criticism to the Historical-Critical Approach to

the Biblical Studies". In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6, n. 6, 2025, pp. 92-101.]

克莱斯。《克莱斯论诗篇》。吴致莹，陈永财，谢乐知译。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Clines, David J. A. *David J. A. Clines on Psalms*. Translated by WU, Zhiying, CHEN, Yongcai and XIE, Lezhi. Hongkong: Logos Publishers, 2008.]

姜宗强。《柯大卫》。载《圣经文学研究》第 2 辑，2008，第 377-382 页。[JIANG, Zongqiang. "David J.A. CLINES." I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2, 2008, pp. 377-382.]

柯大卫。《以赛亚书第 40 章中的多种声音》。姜宗强译。载《圣经文学研究》第 2 辑，2008，第 86-107 页。[Clines, David J. A. "The Many Voices of Isaiah 40." Translated by JIANG, Zongqiang. I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2, 2008, pp. 86-107.]

柯大卫：《圣经研究的学习，教学和研讨：现状与未来》，马乐梅译，载《圣经文学研究》第 7 辑，2013，第 1-33 页。[Clines, David J. A.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Biblical Studies: Today and Tomorrow." Translated by MA, Lemei. I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7, 2013, pp. 1-33.]



The Text-Centere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of David J.A. Clines

Annuo YI  <https://orcid.org/0009-0003-4250-4936>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15733980909@163.com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pivotal methodological shift and its subsequent integration in the academic career of the prominent British Old Testament scholar David J.A. Clines.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and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Clines, building on his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s, shifted toward a literary-synchronic criticism centered on the final form of the text, while repositioning the function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how *The Theme of the Pentateuch* systematically critiques the then-prevalent tendencies of “atomism” and “geneticism” in biblical scholarship,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final form” as the primary object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Subsequently, taking *The Esther Scroll* as a case study, it illustrates how Clines utilizes literary-critical insights as analytical tools to retrospectively explore the compositional history of the text, thereby achieving a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synchronic analysis and diachronic study. Through this analysi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Clines’ methodology not only addresses the limitations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but also offers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ive model for biblical studies—one that respects the integrity of the text while incorporating its historical depth.

Keywords: David J.A. Clines, Historical Criticism, Literary Criticism, Final Form, Pentateuch, Esther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12_\(27\).0007](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612_(27).0007)

Submitted Date: Mar. 20, 2026

Accepted Date: Aug. 6, 2026

Published Date: Oct. 21, 2026